

绪 论

一 中国学术思想的历史演进

(一) 学术与学术思想

学与术本来是分家的。学是指学问、学理或学科，术则是指技艺、技术或方法。学术合起来是指较为专门的有系统的学问。学问是能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的系统知识。中国近代教育家蔡元培办学，学术上采取‘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认为大学就是研究高深学理之所。他在爱丁堡中国学生会与学术研究会欢迎会的演说中又进一步论述了学与术之间的关系：学是学理，术是应用；学与术之间是有区别的，必须并进才好；各国大学中所有科目，如工商，如法律，如医学，非但研求学理，并且讲求适用，都是术。纯粹的科学与哲学，就是学，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两者并进始可。^①作为学科领域中的每门专业学问，大致上要实施三个方面的研究，一是历史发展研究，二是基础理论研究，三是应用实践研究。学术研究要基础、应用研究并重，不可偏废，要有学有术，二者密切结合。有学无术是脱离实际，有术无学是无源之水，缺乏生命力。

中国的学术研究在近代以来有较大的发展。曹聚仁早年曾笔

^①《蔡元培教育文选》，136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

录章太炎的“国学”演讲完成了《国学概论》。他后来谈及“国学”时说：“国学”是外来语，并非国产。日本人曾有“支那学”、“汉学”之称。19世纪后期留学日本归国的学人，所译的“国学”就是“中国学术”的意思。日本人翻译章太炎的《国学概论》，便称《支那学概论》。还有人称“国学”为“国粹”，章太炎称之为“国故”。他的《国故论衡》就是专论中国学术的，因此又曾有“国故学”之说。曹聚仁曾把《国故论衡》和《文心雕龙》、《史通》等学术经典等量齐观，并认为时人即便是写了100万字的“中国学术思想史”，也未必有它那么丰富的内容。还打算将《国故论衡》的“诸子学”篇作为他讲授“中国学术思想史”的教材。在曹氏看来，“本来谈‘国学’或‘国故’的，总以为是中国独有的学术思想，其实‘国学’者只是‘在中国’的学术思想，并非只此一家的学术”^①。后来他又说，把“国学”说成是中国的学术思想，自当包括“文史”在内。他还说：“国学”或“国故”一词内涵本来含混，可说是中国文化史，也可说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从先秦诸子一脉说开去，又可以说是中国哲学史。

蔡尚思先生在1932年于上海启智书局曾出版中国学术研究专著《中国学术大纲》，其中解释“国学”时称“国是一国，学是学术，国学便是一国的学术，其在中国就是中国学术。既然叫中国的学术，那就无所不包了；既然是无所不包了，也就无所偏倚了。因此他认为，曹聚仁把国学单指为中华民族之结晶的说法，吴文祺把国学视为中国语言文字学的说法，抑或章学诚、章太炎将国学视作以史学眼光观察一切的观点，以及那些将国学误认为是单指国文与中国文学的说法，都是不全面的。

近年来张岱年先生在国学研究上颇有成就。他在《国学丛书·序》中称：“国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称“中国学术”为“国学”已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名称了。中国传统学术内容丰富，包罗宏广。

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12页，北京，三联书店，1986。

明清之际方以智论学术，将学术分为三种：一为质测之学，即自然科学；二为通几之学，即哲学；三为宰理之学，即关于社会政治的学说。清以来诸多学者论学术，又将学术分为二类：一为义理之学，二为考据之学，三为词章之学（持此说的主要是戴震、曾国藩），用今天的术语来说就是哲学、史学、文学。后来有注重国计民生的学者倡导经世之学，即关于政治、经济的学问。而后学术又不断发展，国学的内容分科越来越多，越来越细。总之，中国传统学术包括哲学、经学、文学、史学、政治学、军事学、自然科学及宗教、艺术等。^①张岱年关于“学术”的上述解释和曹聚仁、蔡尚思大同小异，但也有独到之处。

关于“学术”的阐释，梁漱溟在《东方学术概论》中的观点也值得重视：“学术出自人类的智慧而育成于社会交流之上。所谓人类智慧非他，人心内蕴之自觉是也。凡用心在某一问题者运用感官探索之时，必留有印象于衷怀之自觉中，先后多次较量，乃悟得其相关规律，从而步步深入焉。然一人经验有限，更赖彼此交流，先后传递修正，由小道而蔚成大观。”^②此外，梁氏还就学术与人类生命和生活的关系进行过论述。他认为：学术是社会的产物，因为人类的意识原本就是人类社会的产物，所以一切学术都产生于内蕴自觉的意识作用；学术是人类生活中所倚以解决问题的，解决了困难障碍，即取得了自由；学术进步，不外是奋进不已的生命本性通过人类社会交往而发挥表现出的前进；学术莫不应于问题需切而来，有什么问题，产生什么学术；人生具有性质不同的三大问题，即人对物的问题、人对人的问题、人对自身生命的问题等。梁漱溟尝谓，他从少年时便对人生问题烦闷不解，使他不知不觉走向哲学，出入乎百家，一旦于人生道理若有所会，则亦不复多求；同样，

^① 张岱年：《国学丛书·序》，12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

^② 梁漱溟：《东方学术概论·绪论》，1页，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8。

因中国问题几十年来急切不得解决，又使他不得不有所行动，并耽玩于政治、经济、历史、社会文化诸学，一旦于中国前途出路若有所见，则亦不复以学问为事。从梁漱溟对个人学术思想发展轨迹的阐述，可以概见他对学术思想的整体理解。学术思想在他这里，是和人生问题与中国问题（社会问题）密切相关的。

对学术思想的理解持与上述相近观点的还有曹聚仁。他曾不止一次地说：“一种学术思想，便是那一时代的人，在那一社会环境中，对社会人生问题的一种新的解说。”^①在他看来，中国学术思想，便是中国历史上不同时代的人，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对发展变化着的社会人生问题的新的解说。曹聚仁对学术思想的认识，既强调了与社会人生问题的密切关系，又强调了特定的社会环境的作用。

强调学术思想离不开环境影响的还有王伯祥、周振甫。1935年，他们在亚细书局出版了《中国学术思想演进史》一书，其中谈道：“学术思想是人类生活奋斗中所蕴育的粲（灿）烂之花。因为人类满足他生存的欲望，便须和四围的环境奋斗，奋斗的结果便创造出人类的文化来。各式各样生活的方式就是文化的结晶，学术思想就是文化的精神。所以学术思想离不了环境的影响，同时又总是归结到人类生活的改进。”他们将学术思想归结为文化的精神。

其实，梁启超也曾把学术思想视为精神。1925年8月，他在群众图书公司出版有《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变迁史》一书，其中说道：“学术思想之在一国 犹人之有精神也 而政事、法律、风俗 及历史上种种之现象，则其形质也。故欲觐其国文野强弱之程度如何，必于学术思想焉求之。”“学术思想，与历史上之大势，其关系极为密切。”梁启超于此主要强调了学术思想的重要性。

不过，将学术思想置于重要位置来认识的何止其一人。钱穆

^① 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212页，北京、三联书店，1986。

是中国现代研治学术思想史的大家。他的著作，尤其是史学著作处处渗透着以学术思想为核心的文化史观。他把社会划为三个层次：“最下层之基础”为经济；“最上层之结顶”为政治制度；“中层之干柱”则为学术思想。因此，他主张以文化学术为中心来考察和分析历史问题。^①此外，海外学者南怀瑾在《楞严大义今释后记》中的一段话，也说明了他对学术思想的重视：“从前受蜀中一前辈学者嘱咐云：‘人心世道，都由学术思想而转移。文字是表达学术思想的利器，可以利人，亦可以害人。聪明的思想，配合动人的文辞，足可鼓舞视听，成名一时。但现在世界上邪说横行，思想紊乱，推原祸始，都是学术思想制造出来的。’”因此，他的著作正是为以学术思想转移人心世道而撰述。

至此可以说，既往学术大家在认识学术思想方面，见仁见智，各有独到之处。这里不可能也无意于对学术思想作什么确切界定，因为这个任务是只有作了更多深刻研究的博大精深者才能承担的，于此只为一般探索之便，将学术思想的涵义作以下概述：学术思想是在特定社会环境实施较为专门、系统的学问研究过程中，运用创造性思维方式获得的理性认识。本书所谓“学术思想”，即取此涵义。

（二）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分期与演进

中华民族的古老和睿智，从她悠远的学术思想渊源即可概见。梁启超研治中国古代学术思想，曾将其渊源上溯到黄帝子孙那里。而后，他又把中国数千年的学术思想史划分为八个时代：春秋以前为“胚胎时代”，春秋末及战国为“全盛时代”，两汉为“儒学统一时代”，魏晋为“老学时代”，南北朝、唐是“佛老时代”，宋、元、明是“儒佛混合时代”，清以后 250 年是“衰落时代”，民国年间是“复兴时

张媛主编：《史学概论》，149~150 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

代”。这便是梁启超在《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变迁史》^①中的分期。梁氏作为研治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大家之一，还曾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他的分期无疑可备一说。

1935年，王伯祥、周振甫著《中国学术思想演进史》^②按照中国学术思想各历史发展阶段的特点进行分期，共分为七个时期：第一，“神权的崇拜”时代 先秦以前 神权的迷信盛行 主要归结到尊祖敬天两个观念上，当时人们的整个生活、一切事务行动都听命于天 过的完全是神权的生活。第二，“阶级的觉醒”时代 神权渐渐衰落，宗法社会组织开始完备。维持宗法组织，人就可以生活安定，便不用去崇拜神权。但随着宗法社会的根本动摇，社会又起纷扰。要谋安定之法，便又出现先秦诸子。诸子各以其道易天下，各用其法来谋新的安定，所以先秦学术思想可归结为“阶级的觉醒”。第三，“利禄的营求”时代：两汉社会是大乱之后重新平静的社会，为保持安定，减少扰乱，于是出现用神权来保障皇权的情况，阴阳五行和图讖便充斥两汉。在上者需要神权来稳固皇位，在下者就用迷信来媚上以取利禄，所以阴阳五行的思想又可称为“利禄的营求”。第四，“个人的发现”思想时代 阴阳五行思想发展的结果 引起王充的大力反对迷信，认为一切从闻见得来的知识都靠不住，只有反求之内心的理论而没有错误矛盾的可以相信，这便是魏晋思潮的发轫。本着“轻闻见重心知”的观念发扬光大，便造成了魏晋玄学。当时社会环境恶劣，名士不愿参政而谋个人安定。这种一任内心的行动，正是个人的真正发现，所以此时期的思想可称之为“个人的发现”。第五，“大我的寻证”思潮时代 这时佛学传入中国，至隋唐而极盛。佛学以探求整个宇宙的安定为宗旨，主张个人和宇宙打成一片，认为要谋一己安定，就要谋全人类的安定。这比

上海，群众图书公司，1925。

上海，亚细书局，1935。

起浅薄的个人主义来，自然是博大精深的。到了宋明时代，这种个人和天地一体的观念更成了新儒学的精神命脉。把佛学和儒学结合，便产生出适应中国环境的理学了。由于佛学理论虽然圆满而它的生活方式与中国国情不合，一班士大夫只能采取它的学理而不能实行它的生活，于是佛学后来自然就衰落了。这一长时期的种种思潮，可以称为“大我的寻证”。第六“古代生活的检讨”时代：“大我的寻证”全靠用心去体会，于是就偏重心性的讨论。陆王一派的唯心论注重内心自不必说，即如朱熹的讲致知，偏重格物，精研经籍，目的无非是发明一个“理”。这个理却是得之于天而存之于心的，所以圣经贤传也不过用来磨炼心中的理，使之更明彻。这样，必然生出专讲心性而忽略一切实际的流弊，于是清儒使用实事求是来反对宋明理学的空谈。又因清代为满族主政，文网极密，学者的心思才力便遁于考证一路。考证的目的是求理。他们认为宋儒凭空研究出的理不可用；要求理，只有从古圣经书中考证探讨，考明圣人经书中的义理就成了直接目的。这便是“古代生活的检讨”时代。第七“民族的自觉科学的认识”时代：晚清近代以来，西方挟其科学的物质文明向中国进攻，使中国陷于极度的混乱。结果，开始出现模仿西洋的船坚炮利、抄袭西方的政治制度、介绍西洋的学术思想的弊端，反而对自己的固有的一切发生了怀疑，失去了民族的自信力，于是便有民族主义的倡导和东西文化的论争，这些都可以归之于“民族的自觉科学的认识”。

中国近代以来研治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学者从章太炎、梁启超，到钱穆、曹聚仁、蔡尚思、杨东莼、王伯祥、周振甫、张岱年等，真可谓是名家辈出。在此引用或讲述一二即可概见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阶段和历史演进的轮廓，无须一一赘陈。上述分期说也并非完美的，但它对后来学者宏观了解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发展轨迹是有益的。说它并非完美，主要在于许多学说阐发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以后，却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的发展

进步讳莫如深，几未顾及。虽然分期说中也曾使用“阶级”“唯心”等字眼，但他们的观点仍然具有非无产阶级的烙印。我们无须去苛求前人，但我们有责任尽自己所能地补苴罅漏，或力所能及地接着讲述。

五四运动以后，由于马列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在中国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异军突起、曲折前进的局面，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文学等诸多学科，都开始冲破种种阻力产生发展，终于汇聚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洪流。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李达、艾思奇、郭沫若、范文澜、鲁迅、胡风等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反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封建主义专制贯穿中国革命始终。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思想的曲折发展必然和反帝反封建运动密切相关，而且受着它的深刻影响。

五四运动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的这一时期，也可以说是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历史上的承前启后的转折时期。它既对中国古老的传统学术思想有所批判、扬弃和承继，又对外来的学术思想有所筛选、吸纳和迎拒。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学术思想经过外部冲击和内部变革的双向合力作用而开始重新建构和整合，并在崎岖曲折中以新的姿态向前发展。

当然，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异军突起，涓涓细水逐步融汇成势不可挡的强大洪流，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同时，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在此间也没有停滞。不仅有不少学者主张保存“国粹”、整理“国故”，稍后并成为新考证学派，更有新儒家（学）一脉也在不断前进，并成为中国学术思想构成的一部分。胡适作为中国学术思想大家引进西方资产阶级治学方法，创立了自己“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十字真言”在中国的学术思想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顾颉刚曾在胡适的治学思想影响下，将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向前推进了一步。钱玄同曾不止一次地向顾颉刚阐述五四后整理国故的新观点，说：今文学是孔子传衍，但

因长期蜕化而失其真面目；古文经异军突起，也是用搜罗古代史料参合己意改造而成。今文家攻击古文经伪造，说得对；古文家攻击今文家不得孔子真意，也说得对。我们应该用古文家的话去批评今文家，用今文家的话来批评古文家，把他们的假面目一齐撕破，才能露出他们双方的假相。顾颉刚对钱氏的思路赞同而不墨守，并作了补充。他在辨清今古文家面目之后又前进一步，对为什么有今古文家及其出现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进行了分析，进而在胡适治学方法论的引导下，成功地提出了震惊学术思想界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形成了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古史辨派”。

中国学术殿堂在五四以后，除了马列主义登堂入室占有一席之地，且颇具活力以外，来自西方的其他学术思想也不断问津。且不说罗素、杜威在华的巡回讲学，即如康德、柏格森、黑格尔、马赫、尼采、弗洛伊德等的学术思想、学术著作也都曾被译介过，在学术界和大学讲坛上也曾有过地位，但并没有什么大发展和大影响。除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异军突起之外，在中国现代学术界还有一个比较具有创造继承性特色的重要学术思想流派——中国现代新儒家。

现代新儒家（或称现代新儒学）在辛亥、五四以来的二十世纪的中国现实和学术土壤上，强调继承、发扬孔孟程朱陆王，以之为中国哲学或中国思想的根本精神，并以它为主体来吸收、接受和改造西方近代思想（如‘民主’、‘科学’和西方哲学如柏格森、罗素、康德、怀特海等人）以寻求当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现实出路^①。当代新儒学在学术思想上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归宗儒学，把儒学作为思想信仰。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熊十力、梁漱溟、贺麟、冯友兰、牟宗三、张君勱、钱穆、唐君毅等人。新儒学从民国初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都没有停滞不前，尤其在海外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264页，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

和港、台的华人学者中，新儒学有长足发展。

二 建国以来学术思想史的研究范围

（一）建国以来学术思想史的分期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官、封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辟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纪元、新时代。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上升为统治阶级。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如果说在新中国建立以前是异军突起，成为具有浩大声势、猛烈威武的文化生力军，那么，它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则是全面地高歌猛进，和强大的人民民主专政相伴随行，占据了整个历史舞台的中心。从此，中国的学术思想也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1949年新中国诞生以来，中国学术思想历史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五个时期：1949年至1956年是第一时期；1956年至1965年是第二时期；1966年至1976年是第三时期；1976年至1984年是第四时期；1984年以后是第五时期。

第一时期从1949年到1956年，是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的高歌猛进时期。建国之初，在党的领导下，全国开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宣传运动。学术界在对知识分子进行团结、改造的同时，又开始对在旧中国学术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和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学术思想进行了批判。1951年至1952年，通过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学术思想得到了初步清算。1954年至1955年，通过开展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学术思想的批判，在学术思想界大力宣扬了唯物主义，

促进了各个学术领域中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成长。很快，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统治地位被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学术思想领域的领导地位和指导地位初步确立起来，绝大部分学术工作者都愿意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开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重新开展自己的研究工作^①。第一时期是中国学术思想主流由旧中国的封建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转向新中国的无产阶级学术思想方面的转折时期，其中包括学术思想发展飞跃过程中相辅相成的破与立、克与生。总的发展趋势是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思想在各方面高歌猛进。毋庸讳言，在学术思想批判运动中，已开始有“过火”、“过头”等“左”的现象出现，甚至把学术和政治混同起来。刚刚抽身血与火战场的领导者，在领导学术思想批判运动时，借鉴了一些开展阶级斗争经验，曾出现一些偏差和失误。

第二时期从1956年到1966年，是各项学术研究全面开展时期，同时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思想发展活跃、经历曲折的时期。1956年，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在认识到自己的“左”倾苗头时及时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学术指导方针。这一方针极大地鼓舞和激励了学术界的科学研究热情，学术思想出现了空前的活跃。随着1957年在共产党内提出整风运动后，一种反社会主义倾向有所抬头^②。反击反社会主义的思潮是必要的，但却出现了扩大化的错误，一方面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抬头估计过高，一方面错把学术问题当成了政治问题。反右斗争的扩大化错误对学术思想的正常发展进步带来的消极影响是很大的，再加上后来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对学术界的直接影响和冲击，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在“左”的错误严重泛滥开来的情势下出现了曲折。尽管在1962年的调整阶段党对双方

蒋学模：《对于我国学术界成就的两种估计》载《学术月刊》，1957(12)。

且大有：《学术思想批判与整风运动》载《学术月刊》，1958(3)。

针重新予以强调和恢复，学术思想界再度活跃，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阴影一直没有完全消除。特别是到了“文化大革命”前夕，“左”的思想倾向日益严重，对学术思想进行政治批判的偏向越来越明显，“双百”方针的贯彻再次受挫。

第三时期从 1966 年到 1976 年，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学术研究的全面中断，学术思想受到禁锢和扼杀的时期。“文化大革命”期间，“左”倾思潮肆虐，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的发展出现一个低潮和大波折。此间，由于文化专制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推行，正常的学术思想被禁锢和扼杀，文化学术界百花凋零，万马齐喑。

第四时期从 1976 年到 1984 年，是中国学术思想复苏解放及向前十七年学术复归时期。粉碎“四人帮”后，随着对其反动谬论的揭露和批判，特别是全国性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开展，“左”的学术思想遭到批判。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受到批判，50 年代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重新提倡，并成为新时期学术研究的指导方针。在“双百”方针指导下，中国学术界对建国以来的学术思想进行了初步的反思，对“左”的学术思想进行了批判和肃清，从而形成了建国以来学术思想的又一次巨大转变，学术思想的解放成为新时期学术思想发展的主流。正是在学术思想解放的潮流中，广大学人对建国以来许多学术问题重新讨论和争鸣，对过去一些被视为“禁区”的学术领域进行了大胆探索，撰写了大批高质量的学术著作，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学术观点。中国学术界出现了学术思想重新活跃的可喜局面。

第五时期从 1984 年到 90 年代，是当代中国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并日趋繁荣时期。80 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中国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及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中国学术界对许多学术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尤其是海外学术思潮的大规模涌入，

使中国学术思想进一步解放，并促发学人们对建国以来的学术思想进行第二次反思。在“挑战与危机”的新形势面前，中国学人在“双百”方针指导下，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坚持学术研究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方向，积极引进海外先进的学术研究理论和方法，开拓学术研究的新领域。他们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大胆开拓，勇于进取，在中西学术思想的撞击与融汇中，在不同学术观点的相互切磋中，为促成中国学术思想、学术事业的新的更大高潮的到来而共同奋斗，从而形成了建国以来学术思想空前活跃的局面。一个学术思想界的百家争鸣的繁荣时期正在到来。

（二）建国以来学术思想史的研究范围

中国作为一个文化积淀异常深厚的国度，可以说是学者辈出，著述如林。尤其是新中国建立四十多年来，学术研究环境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除了在“左”的错误严重泛滥时期，特别是在十年文化浩劫时期，学术研究出现曲折和遭到摧残外，整体上看学术研究环境和氛围还是良好的。因此，反映建国四十多年来学术思想的著作成果可以说是灿若群星、汗牛充栋。但是，关于建国以来学术思想史的系统研究成果却不多见，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因为建国三十多年时间，政治上大大小小的波折连续不断。学术思想变迁和政治发展大趋势密切相关，学者历经政治运动，或噤若寒蝉，或趋向远古而远离现实，对于社会敏感的当代学术史问题多不触及。二是建国以来学术思想的发展往往受到政治运动的影响，又过分强调学术为现实服务、为政治服务，于是只有哲学、历史、文学理论迫于社会政治的强制作用而并称显学，一度畸形发展，其他学科或空白、或停滞，这也给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带来困难。三是建国以来学术思想的主体——广大中华学人，尤其是诸多在当代具有重大影响的学者，如今大都还健在。这一方面给学术思想史的

研究带来有利的条件，可以用访问来弥补某些不足；但另一方面，也给学术思想史研究者带来某些顾虑。评鹭在世硕学，总嫌学力不逮而惟恐有所偏失，没有‘盖棺论定’显得容易一些。因此，当代人不写当代史的思想还相当浓厚。以上这些原因都使得建国以来学术思想史的研究领域显得比较贫瘠。我们编写此书即是抛砖引玉，希望能促进此领域研究的繁荣昌盛。

那么，建国以来学术思想史研究到底应该包括哪些主要内容呢？我们认为，从实际出发，主要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 学术方针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某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任何统治阶级也不可能只允许一种思想存在，而不允许甚至禁绝其他思想存在；如有之，那也只能是暂时的或者只存在于一定范围、一定形式中。没有矛盾的清一色的学术思想的发展是不存在的。新中国建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一路过关斩将，高歌猛进，资产阶级学术思想遭到批判；但这不等于说新中国只发展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其他学术思想就不存在，完全绝灭了。这正如唯物主义占据了哲学舞台的中心，唯心主义仍然照样存在一样。任何事物的发展似乎都有一个对立面，即便是单一学术思想的发展，也要有不同流派。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以后，经过短期的休整，便结合科学发展特点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科学的“百家争鸣”方针。这是促进新中国科学事业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方针。所谓“百家争鸣”主要是指科学上的不同观点、不同学派可以自由、平等地争论。科学上的是非要由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充分争辩来解决，通过实践检验来解决，而不能用行政的力量去强制推行某种观点、压制某种观点，支持某个学派、反对某个学派，不能用简单粗暴的方法来解决学术上的是非问题，不能用处理政治问题的办法来处理学术上的争论问题。当然，“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也并不是没有阶级性的。“‘百家争

鸣’作为我国促进科学的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项重要方针，它是有特定的政治含义的，是有鲜明的阶级性的。不能把贯彻‘百家争鸣’方针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立起来，不能把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理解为人们完全可以不顾社会效果，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只讲自己有发表意见、批评别人的权利，不讲别人也有发表不同观点、批评自己的权利。^①“百家争鸣”方针是党和政府提出的一以贯之的学术指导方针。它在实行中间虽然历经曲折，但终究在反复曲折中被稳定地确立了起来。建国以来学术思想的活跃与繁荣，“百家争鸣”学术方针起了重要的关键作用。可以说什么时候“百家争鸣”方针得到贯彻，学术思想就繁荣发展；什么时候“百家争鸣”方针被破坏或名存实亡，学术思想就停滞和枯竭。因此，研究和探讨建国以来的学术思想史，首先不能不顾及到“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贯彻执行与确立问题。

2. 学术思想批判运动

一种学说的自身发展是相克相生，而且不同学说之间也是相克相生的。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演变过程，实际上也是各种不同学术思想流派彼此消长、相克相生的矛盾运动过程。一个新学派的兴起，必然是对另一学派的否定和批判（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经今古文之争便是如此）；同时，不同学术思想流派又要在矛盾冲突中互相借鉴、渗透、融合（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儒、释、道三家合流即是如此）。从民国初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后，由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到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占主导地位，这本身也可视为是一种相克相生的过程。相克相生，实际上就是矛盾体的对立与统一。就矛盾方面的“相克”来说，就表现在学术思想的批判运动上。建国以来学术思想发展演变的

吴永瑜：《编辑学通论·贯彻“百家争鸣”方针》，90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

历史，在最初阶段，很大程度上是表现在学术思想的批判运动上。这种学术思想批判运动，主要是批判旧的学术思想，建立新的学术思想，即批判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建立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无产阶级学术思想。学术思想批判运动不是单人个体的行动，而是有组织的群体行动。建国初期开展的关于电影《武训传》艺术思想、关于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思想、关于胡适学术思想、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等的批判，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群体批判运动，只不过这些批判运动有的是批对了，有的是批过了头，或者是由于其他因素影响批转了向，或者是不该批判的而只管进行了批判。新中国建立之初，进行学术思想批判是必然的，也是必需的。从战场抽身转向学术思想批判的领导者，闪失是难免的。建国之初，没有对旧学术思想的批判，就树立不起来马克思主义在学术思想各领域的主导地位。学术思想批判运动到后来开展得越来越频繁、广泛，并且在“左”倾思想指导下又变成了政治批判运动，再后来更被别有用心心的政治野心家阴谋家所利用，直到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以走上正轨。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指出：“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科学严谨的学风，鼓励不同学术观点的相互切磋。要注意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对思想认识问题要积极引导。对事关政治方向、事关重大原则的问题，要旗帜鲜明，分清是非，保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决议不再提学术思想批判。研究建国以来的学术思想史不能不观照学术思想批判运动，尤其是那些影响全国的运动，因为这里边既有经验，也有教训。

3. 学术思想的争鸣、讨论

战国时期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最活跃的时期之一，除了儒、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新华社北京 1996 年 10 月 13 日电。

墨、道、法诸家“显学”，还有阴阳、农、名、纵横、兵等家。它们各家可以进行学术讨论、争鸣和互相渗透，所以这一时期被称为“百家争鸣”时代。“百家争鸣”实际上在后来成为发展中国学术思想的最佳途径和办法。因此，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也借鉴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来作为学术发展的指导方针。可见，争鸣、讨论是学术思想正常发展的最佳选择。建国以来的学术思想发展历史，也充分显示了争鸣、讨论的重要作用和意义。学术思想的争鸣和讨论，可以不分学派、不分地位高下，平等地自由地进行辩论和探讨，使学术问题越辩越清，科学真理越辩越明。建国以来的几乎所有重大学术问题，都曾经在各种场合、媒体上进行过争鸣和讨论，有的在全国范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有的甚至发展到在不同国家之间进行。因此，建国以来学术思想史的研究也必须注意到学术思想重大问题的争鸣和讨论。

4. 个体学者的学术思想

学术思想的主体是学者。要研究建国以来学术思想的历史发展，必须十分注重对著名学者个人学术思想的研究。正是因为有个体学者的学术思想，才建构成建国以来整体学术思想的大厦。学者如林，学术思想成果层见迭出；学科众多，每一学科都是从总体、综合开始，逐步向细密的分支和部类过渡，然后又导致新的综合。要想逐一学科逐一学者地进行研究，那简直是不可能的。因此，选择重要学科具有代表性的学者进行个案分析和典型探讨就显得十分重要。

那么，如何从学者如林、思想如云的学术思想的浩瀚海洋中去选择代表和典型呢？我们借鉴了《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辞典》的编辑方针，大致确定如下标准：(1)综合标准，即学术水平、学科理论价值和社会影响三者俱佳的学者。(2)学术思想标准，充分反映时代学术思想发展水平，具有典型性论著的学者。(3)理论价值标准：对重要学科、重要理论问题具有独到、新颖的学术观点的学